

新书《见证中国和平崛起和友好发展》出版 3

韩英平和马咏南为吴志曼文集之二写感言和序文

当时政府已经下禁令了,难道您不怕被抓到受刑吗?"他开怀大笑,信心满满的回答道:"我当然不怕了,因为我有理由辩驳,语言是平等的没有阶级性,为什么英语、日语都可以,只有中文不可以?英语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,英语更容易学,而且更普及,而中文学习难度高,只限于华人圈。这样政府就没理由惩罚我了。"

1975年乌玛尔终于被释放了,结束了八年的监牢生活。但是这段牢狱之灾也在乌玛尔的生命里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居民证上刻着“政治犯”这一刺眼的字眼,找工作很困难。

1978年,乌玛尔辗转转到加里曼丹,好不容易在一个木场找到了工作。木场的T作很辛苦,他和工人们一起在烈日炎炎下上山砍伐木材,每个星期排队领薪水。刚开始时乌玛尔不相信世上会有这

样艰苦的事情,辛苦工作了一个星期,到最后薪水还要排队来领。

但是现实如此,乌玛尔安慰自己要用平常心来面对。在木场做了三年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,先生认识了一个台湾人,台湾人很吃惊他居然会讲华语,便和领导沟通让他做月工,待遇好了很多。乌玛尔在木场里一做就是三年。

恢复印中友协

印中友协成立于1955年。1965年政局变化以后,许多华社组织被破坏,印中友协也难逃厄运。领导人有的被抓走,有的被打死了。虽然没有被解散,但政府控制了印中友协实际上名存实亡。

1998年苏哈多下台,热爱中华文化,一心想促进印中关系的乌玛尔找来几位朋友商量,提出恢复印中友协活动的建议,这一决定得到大家的支持。之后,乌玛尔迅速行动起

来。他前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,向当时的大使陈士述提出了恢复印中友协这一想法。大使告诉他,“可以恢复,但要政府正式承认你们。”这是个大问题。这首先要得到印尼外交部的批准。而外交部要求出示中央警察部,内政部和公安局的同意证明。

为了能使印中友协得以恢复,乌玛尔反复奔波于这几个部门之间。当时先生捉襟见肘,没有足够的钱坐车,他就靠这双脚一年多的奔波下取得了成功。印中友协终于可以恢复活动了!那么经费来源怎么办呢?乌玛尔找了原新华社新校董郑年锦先生。郑先生热心公益,大力支持华教和印中友好,他对郑先生说:“请您帮这个忙。”郑先生同意了,并给予印中友协一万七千美金的资助。靠着这一笔资金,印中友协开始了活动,活跃于印中两国的民间交



1962年,韩英平、Umar、小洪、小二合家照。

流舞台上。

能够恢复印中友协,对于乌玛尔来说,实属不易。其一是因为曾被判为“政治犯”遭到排斥,连找工作都困难,何况还要奔波于那么多部门之间,其二是当时先生没有什么名声,却要领导这件相关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事情,三是当时先生很贫穷,在没有经济支持下依然克服困难成功得到批准。在热心华人如郑年锦、黄烟康等的资助下,2000年4月,印中友协正式复会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,印尼的外交部长,林业部长以及中国、黎巴嫩和越南大使等很多重要人物都出席了。

乌玛尔不敢相信,他在谈及成功恢复印中友协时感慨道,都是因为有大使馆的支持,他感谢政府承认和大使馆支持。正式复会后,先生邀请广州歌舞团来访,他随着歌舞团跑了很多地方,从加里曼丹到棉兰、泗水等。正是因为乌玛尔这样的努力,活动一恢复便得到各地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,现在已

有十二个分会。有一次,中国驻印尼大使兰立俊问乌玛尔,过开斋节可以来你家拜年吗?乌玛尔受宠若惊,告诉他说今年没有准备,明年再来吧。

大使同意了。之后此事再无音讯,乌玛尔以为只是随便说说也没太放在心上。

没想到第二年,兰立俊大使又提出来了。

乌玛尔很感动。于是他筹集资金,把小学里成绩好家里贫穷的三十个孩子组织到家里来,让大使一个个发奖学金。

为了印中友协,乌玛尔鞠躬尽瘁,竭心尽力。当问到组织印中友协,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,乌玛尔感慨道,对于一个民间组织来说,经费的筹集是最困难的。为了让协会维持下去,让每次活动顺利进行,乌玛尔经常奔波叩响社会贤达的家门。他的朋友笑称道“你是一个很光荣的老乞丐。”对于乌玛尔的请求,泗水的林文光,雅加达的陈大江等热心地给予资助,他很感谢他们支持。



1964年吴志曼和韩英平老师带同俩儿子回印尼与父亲(后右)弟弟吉达合影。



晚年韩英平老师和长大的儿子小三